



制度变迁 和农村工业化

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

■ 周飞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制度变迁 和农村工业化

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

■ 周飞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周飞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

ISBN 7-5004-5591-7

I. 制… II. 周… III. 手工业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F426.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2694 号

责任编辑 田文

责任校对 杨翠英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32 千字

定价 1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本书旨在通过研究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来探索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虽然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对外开放通商口岸、洋货和机器制品大量涌入的时期，洋货必然会对传统的手工业部门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某些手工业部门，例如土布业，却在这个时期洋布和本国机布的双重夹击下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在华北和江南，形成了几个大而繁荣的织布区，在这些地区，农民几乎家家织布，织布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而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

本书尝试探索土布业兴旺的原因。口岸通商带来的商业化使得土布业使用的原料由土纱变为洋纱，同时，织布机器也由旧式的投梭机变为效率提高四倍的铁轮机，这都为土布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只是一些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我们看到，土布业只是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兴起，这说明除了洋纱和铁轮机之外，土布业的兴起还有另外的因素。

在其他的因素中，最为突出的因素是一种生产和市场制度——包买制。本书通过数量分析，认为包买制是决定一个地区土布业是否达到繁荣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包买制之所以有如此突出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它所需资本投入小、生产规模灵活、有着有效的控制产品质量的手段，这些优势高度适

合当时中国农村金融状况恶化、资本市场不发达和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所以它对土布业的发展有着极为显著的作用。

本书的结构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评述有关清末民初商业化浪潮对中国农村经济之影响的主要观点。主流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对外通商是导致农村经济凋敝、小农分化和破产的主要原因。导论中指出这些观点对当时农村经济的认识有偏颇，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手工业的研究。

第二章是对手工业发展的文献回顾并提出本书的主要问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国外洋布和国内机布的双重夹击之下，手工土布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那么问题是，在生产效率大为落后的情况下，手工土布为何会取得快速的增长？

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对本书研究的两个重点地区：华北和江南一带棉纺织手工业发展的历史考察。这两章的基本观点是，到清末民初，这两个地区的土布业与以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成了一种完全以商品生产为主、有着高度地区化分工的产业，在局部地区实现了工业化。

第五章是一个定量分析。本书利用华北冀鲁豫三省和江南两省（苏浙）的历史数据建立了一个 Two-Step 的数理模型。模型发现，促使这些地区土布业繁荣的是一种新的制度因素即包买制的出现。

第六章是一个在个案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力图探讨包买制作为一种农村地区的特殊的生产和商业组织，如何促使土布业的快速增长和繁荣。

第七章是结论。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有

着其自身的规律。要解决农村商业化和工业化中的风险问题，使得农民真正能够从商业化中获得利益，生产和市场组织至关重要。这对今天新一轮商业化中的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特点是利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社会史问题。以往国内的历史研究中定量研究极为缺乏，模型更为少见，本书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努力尝试。书中所用的系统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廿四年辑》，浙江、山东、江苏三省的《中国实业志》分册，《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36》，《浙江经济统计》，《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等，并参考了许多文献资料中的零散数据。其中尤为重要是吴知先生的《关于乡村织布业的一个研究》和史建云的《手工业与乡村经济》。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所以最先要感谢的人是我的论文导师龚启圣先生。龚先生是上海人，生于香港，学成于剑桥，身兼西人严谨务实之风与国人循循善诱之德。对于这项研究来说，从假设的提出、方法的选择到观点的形成，都包含了他的心血。另外要感谢我的硕士论文导师王汉生教授。我从事科研工作，王老师是我的精神动力之所在。此书还要感谢许多关心我、帮助过我的许多师友，包括苏耀昌、何杰尧、林益民、Erik Baark、马忠东、何高潮、朱天、吕大乐、赵阳，当然还有我的家人。此书若有立论发人深省之处，功劳在我的导师。若有任何错漏之处则是我本人的责任。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斯密型”还是“过密型” 增长	(1)
第二章	手工业和制度变迁：文献回 顾	(10)
第三章	工业化时代的原初工业化——华 北棉纺织业的历史考察	(35)
第四章	“过密化”与“工业化”——江南 地区的棉纺织业考察	(64)
第五章	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的数量 分析	(92)
第六章	包买制和农村土布业的繁荣	(119)
第七章	结论：商业化、制度变迁和农 村工业化	(152)

图示目录

图 3-1	明代的棉布运销	(40)
图 3-2	清盛世的棉布运销	(45)

图 3-3	华北棉布远销州县	(48)
图 3-4	华北三大织布区	(54)
图 4-1	土布和洋布在 20 世纪 30 年 代价格比 (元)	(79)
图 4-2	松江府织布妇女每天织布净收 益的变化 (升米)	(80)
图 4-3	松江布区外移图示	(81)
图 5-1	(112)
图 5-2	(118)
图 6-1	织户所得工资和自织自卖收入 在总收入中的比重 (%)	(128)
图 6-2	宝坻布业中工资和利润之变 迁	(145)
图 6-3	高阳城及其周围县镇	(150)

表目录

表 2-1	考察经济增长类型的几个标 准	(18)
表 3-1	明代到民国 (1368—1936) 华北三省的棉布外销情况	(52)
表 3-2	土布业在洋布和本国机布竞争 下的发展 (1860—1936)	(53)
表 3-3	华北三个大织布区情况	(62)

表 4-1	松江府三个时期的人口和土地 情况	(66)
表 4-2	明清时期江南棉纺织业中每一 匹布的净收益 (斗米)	(69)
表 4-3	边际净收益的比较 (扣除食用量) (升米)	(74)
表 4-4	川沙县从事非农业劳力在总劳 力中的比重	(85)
表 4-5	江南几个布区在 20 世纪二三 十年代的土布产量 (万匹)	(88)
表 4-6	几个织布区织工平均每天的净 收益 (合成升米计算)	(90)
表 5-1	中国东部五省各县的基本情 况	(94)
表 5-2	两地区各县农村是否邻近铁路 和工业城市	(100)
表 5-3	包买制在土布产值超过十万 元的县中的分布	(102)
表 5-4	解释因素的描述统计	(103)
表 5-5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及其作 用机制 (假设)	(104)
表 5-6	土布产值在华北和江浙的分 布	(106)
表 5-7	土布户均产值的决定因素	(108)

表 5-8	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	(115)
表 6-1	河北省土布生产量以及产 值 (1929)	(121)
表 6-2	定县某村织机数估 计 (1912—1932)	(123)
表 6-3	直隶四县按地亩分组的农户净 收入 (元)	(124)
表 6-4	高阳不同收入组别的织户基本 情况	(127)
表 6-5	不同收入组别的织户收入来源 比较	(134)
表 6-6	高阳布区莘桥镇高阳布线庄分 号情况	(135)
表 6-7	高阳土布业和其他地区织布工 厂成本收益比较 (1932)	(140)
表 6-8	宝坻布业中工资与利润之变 迁 (1922—1929)	(144)
表 6-9	高阳 382 户织户情况	(146)
表 6-10	南通织户平均每家织业收入 在业其农业与织业收入中的 地位	(149)

第一章 导论：“斯密型”还是 “过密型”增长

工业化之前，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自亚当·斯密至今，经济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种是普遍见于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社会的、被称之为“斯密型”（The Smithian Growth）的增长形态。这种看法自亚当·斯密的经典论述而来，主要指的由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地区专业化（Regional Specialization）以及市场扩张（Market Expansion）推动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大大有别于工业革命提供的以机器生产、技术变迁为动力的所谓库兹涅兹增长（The Kuznetzian Growth）。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经济史学家通常将“斯密型”模式看作大部分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式，包括非欧洲社会如中国、日本和印度。但是，自吉尔茨（Geertz）于 60 年代对东南亚水稻农业的先驱性研究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到另外一种被吉尔茨称为“过密型”（Involution）的增长模式（Geertz, 1963）。“过密型”增长是在市场不发达、劳动分工不明显、自给自足而非为市场生产的经济形态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者在边际劳动报酬开始递减、更多的劳动投入已明显“不合算”的情况下仍然大量投入劳力而取得的经济总产出的增长。生产者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剩余劳力难以进入劳力要素市场所致。吉尔茨的这个发现被其他学者应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当

中。黄宗智在对近代中国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中就断定这种“过密化”的状况是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最为主要的特点。究其原因,除了在大多数落后经济体系中常见的人口过多、劳力剩余之外,黄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影响而导致的农业商品化也是加速这种“过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Huang, 1986, 1990)。

如果我们在这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的观点之下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 年)之前的农村经济,立刻就会发现难以骤下判断,因为“斯密型”和“过密型”的增长特征都存在。一方面,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以及市场扩张自明代以来就开始迅速发展,到晚清民国时代受到外国经济势力的影响更是突飞猛进。地区的专业化趋势、劳动分工的状态也明晰可见。但是,另一方面,许多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农民虽然在自己的土地上投入大量劳动,仍然只能维持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那么,此时农村经济的性质究竟如何?我们如何下一个明确的判断?这种状况又是何种因素影响造成的呢?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一系列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到 19 世纪末,外国工业品已经基本在中国国土上通行无阻。这个侵略进程在中国国内伴随着商业关系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工业部门的成长,西方学者习惯将此称为“商业化”的过程(commmercialization)。^[1] 具体而言,商业化影响下的农村经济

[1] 这个术语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在此之前的、明清时期的国内经济并没有商业化,这显然值得商榷。在后面的章节中,本书将展示在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之前国内商业化的发展。但是,无可否认,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商业化的进程变得异常迅速。国内经济不但迅速进入国际贸易市场,而且其内部的市场发展也日新月异。所以我在这里仍沿用“商业化”的术语来概括 1840 年以来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

在学者们眼中有三种形象。

(一)“衰退论”。这是许多中国国内学者的看法。这些学者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农村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状态，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增长，而衰退的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商业化进程。西方工业品的大量输入直接造成了农村手工业的破坏和转化，使得农村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走向破产。在这里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学者认为手工业的衰退直接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衰退，农民难以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农业金融状况恶化，农业投入难以为继，农村经济从而陷于破产（千家驹，1990；陈翰笙等，1989）。

(二)“停滞论”。虽然这类学者对农村经济的看法亦不乐观，但是与“衰退论”者颇为不同。这些学者将农村经济不发展的原因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考察，认为人口和土地关系的变化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总趋势。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农村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是过密的人口。经过从宋至清的发展，到清朝后期，人口和生产率的增长双双到了一个极限，即陷入了一个“高水平陷阱”。^{〔1〕}口岸通商以来的商业化进程提供的商业和劳动力就业机会为农业走出陷阱提供了一个契机，虽然民国时期的农村经济最终亦未能摆脱这个陷阱，但是商业化进程对此不负主要责任（Elvin，1973）。与他的看法相映成趣的是黄宗智的观点。黄亦认为农村经济的不发展主要是人口压力造成的。但是，与伊氏相反，他认为商业化带来的商品性农业的

〔1〕其具体含义是指生产力的任何提高带来的收益都被过多的人口所消耗，所以人均产量难以提高。

发展不但没有能够使得农业摆脱过高的人地比例的压力，反而形成了“农业过密化”。黄认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经济作物的推广种植使得农民可以更加集约化地使用自己多余的家庭劳力，因为商品作物每个单位面积往往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但是，这种集约化经营是以边际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为代价的，因此，自耕农虽然依靠总产出的提高得以维持生计，但边际劳动生产率却不升反降。“过密化”的发展使得小自耕农家庭冒险去种植经济作物，但经常因无力承担风险而破产，导致农村的社会分化（Huang, 1985）。黄氏在另一部著作中强调，只有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农村工业化才真正使得农村摆脱“过密化”的道路（Huang, 1990）。黄的结论和“衰退论”者的观点比较接近，只是论述的机制颇为不同罢了。在黄看来，如果农村经济总量有所增长的话，也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三）“发展论”。持此观点者主要以西方学者为代表。马若孟（Ramon Myers）以及布兰特（Loren Brandt）反对“停滞论”者只注重人口而忽视市场的分析。他们的一系列论著都强调商业化进程对农村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影响。他们指出，虽然人口压力非常沉重，但是商业化进程从两个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经济。首先，农村要素市场更加完备，农户可以在市场上重新配置其多余的劳力和土地。也就是说，因商业化冲击、手工业衰退而剩余出来的劳力不必如黄宗智所言“过密化”地投入到自家的土地上，而是进入市场；其次，商业化带来的商品性农业的繁荣、棉花和烟草作物的推广种植需要大量密集的劳动力投入，这又给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

会。这样市场发展和商品性作物的推广相辅相成，共同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Myers, 1970; Brandt, 1987）。值得指出的是，马和布二人虽然没有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作出量化的估计，但是其分析强烈地暗示出农村经济的发展的趋势。此外，布兰特亦有一系列计量分析的文章显示农民的收入分配并非如国内学者和黄所说的呈两极分化的趋势，而是趋于集中（Brandt and Sands, 1994）。另外一批学者则专注于对经济发展作出总量的估计。现有的两个权威的国民经济的定量估计都认为民国时期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但是这种增长主要集中在现代工业部门（巫宝三，1947；Yeh, 1965）。至于较新的研究成果当属罗斯基（Thomas Rawski）的近著。由于缺少直接可信的资料，罗斯基根据人均棉布的消费量的增长，估计农业和制造业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估计农业的年增长率在“1.4%—1.7%”之间，远高于叶孔嘉（Yeh Kung-Chia）0.8%的估计数（Rawski, 1989）。这个增长率即使和同时期的日本农业相比也不逊色。加上对现代工业部门的乐观估计，罗氏认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冲破人均产量很少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开始“起飞”了。

纵览以上争论，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学者们对于不到100年前的经济史的看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以至于对商业化影响下的农村经济的看法完全相反？

当然，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分析方法的差异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例如，国内学者多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认为商业化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经济的掠夺过程；历史学家着重从人口角度分析而经济学家则看重市场的作用等等。但是，

这都不至于使学者们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学者们之所以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得出近乎相反的结论,主要是对于两个经验性问题没有取得共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商品性农业的作用,一个是手工业的命运。

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作用主要存在于马若孟和黄宗智的不同看法中间,因为二人都没有对农业发展程度作出估计,所以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对于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黄坚持认为社会分化是商业化的一个结果,而马氏则根本不承认分化是一个历史事实(参见马和黄的一系列争论)。但是对于农村经济是停滞还是增长的分歧,关键的问题在于学者们普遍比较忽视的手工业。^{〔1〕}

在论述农村经济发展的学者中,农村手工业大多被作为一个附带部分被论及。但我们仔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手工业恰恰是学者们在作出结论时分道扬镳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无论是“衰退论”、“停滞论”还是“发展论”者,都承认传统的农业部门至少在人均的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技术革新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有限的增长是总量的增长,主要由东北地区新垦土地带来。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发展论”者如罗斯基对农业增长的估计实际上是大部分依照手工业的情况作出的。如我们上面所述,罗斯基采用的两个重要的指标,人均棉布消费量和农村制造业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实

〔1〕 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对农业生产技术和作物单产(土地生产率)的提高的影响,两位作者都不持乐观态度。就劳动生产率而言,黄认为“过密化”实际上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了,而马则暗示要素市场的发达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他们都没有对农业的总体发展趋势作出量化的估计。

际上代表了手工业而非种植业的增长情况。布兰特在对1870—1937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村经济作出估计时，采用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手工业部门中的工资水平（Brandt, 1989）。另外，发展论者认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论据即是农业雇佣劳力工资水平的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农业雇工的工资水平并不一定反映农业的增长。即使农业没有任何变化，手工业的增长和衰退也会直接影响到农业工人工资的提高和下降，因为手工业和种植业依赖的是相同的农村劳动力。

这样，我们可以发现，种植业的落后和不发展其实是学者们在不同程度上的共识。那些强调“发展”的学者主要证据实际上来自农村手工业的“发展”，而强调“停滞”和“衰退”的学者主要证据来自种植业，当然这些学者一般也认为手工业基本处于和农业相同的命运，或者苟延残喘，或者风流云散。因此，要弄清农村经济在商业化影响下的真面目，一个至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实际上是弄清农村手工业在商业化影响下的真面目。

以今视昔，农村手工业在晚清民国时期不仅是我们判断农村经济性质的关键，而且其重要性就如同乡镇企业对80年代农村发展的作用一样，是农村走向工业化的开端。后面的章节将重点考察这样几个紧密相关的问题：

（1）这种工业化的进程是否在晚清民国时期已经启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笔者判断农村工业化的主要标准并非是考察手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而是根据“过密型”和“斯密型”的标准，考察手工业的性质。在明清时期，大部分手工业是为了满足“自然经济”中家庭消费的需